

---

# 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

## ——以吴开先案为例

邵铭煌

---

两国对仗，有地上交火，也有地下角力，无论地上地下，目的都是为了驱敌制胜，战场规模和激战程度或有差异，惟对于战争结果的作用则一。对日抗战时期，御侮拒寇，陆海空大小战役无数，政治过招频频。然而，在正面作战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屈伏黑暗角落里，默默活动，为捍卫国家前途与稳定陷沦区孤零无助的民心，冒死与顽敌斗争。中国国民党高级党工吴开先奉派潜返上海，重振党务，与日伪周旋，以争取人民支持，就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例，值得加以探究。

多年来，学界投注于地上战场之研究，成果蔚然可观。关于沦陷区地下抗争的研究，却有如一处暗角，鲜为人所注意。关于吴开先案，虽可见到一二种简略记述，也都有几分真实，然尚非十分明白。本文主要根据吴开先手撰遇难报告及当时上海地下组织与重庆间之秘往函电，并参考相关史籍，勾勒案情实貌。拟藉由对汪精卫政权与日本军宪机关捉放吴开先案之探讨，提供了解汪伪与重庆方面地下斗争的一个媒介。意在抛砖引玉，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探索地下斗争层面，推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以建构史实全貌。

## “上海的党皇帝”——吴开先

吴开先, 1898年生于江苏青蒲县, 上海法科大学经济科第一期毕业。曾任松江中学教员, 后至上海创办“君毅中学”, 自任校长。1922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前, 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交通科干事。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后, 转任青浦县政府秘书, 由于县长高乐柏为共产党员, 吴开先曾策动群众运动, 以打倒土豪劣绅名义, 展开斗争, 使地方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之中。1927年, 国民党实行清党, 吴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反共文章, 又回到上海市党部, 担任组织部秘书一段时期。此后至抗战前, 吴步步高升, 自1929年始出任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多年。1931年5月, 出席国民会议, 同年任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 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5年11月, 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翌年7月, 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总的来说, 由于长年担任党务, 与上海各方面关系深厚。尤其是和杜月笙之交情, “有水乳交融之状”, 所以上海发生过几起大工潮, 如法租界水电工潮、英美烟公司工潮等, 两人都能密切合作, 居中调解劳资纠纷, 发挥大作用, 声势颇盛, 因而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sup>①</sup>

抗战爆发后, 吴开先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一组

<sup>①</sup> 关于吴开先事迹, 参见朱子家: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 香港春秋杂志社1961年版, 第147页。徐友春主编: 《民国人物大辞典》,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367页。朱子家谓吴开先早年曾加入CY, 政治立场一度倾向共产党, 惟从其他相关资料中并无类似记载。

组长, 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sup>①</sup>, 跃身为一中央高级党务工作人员。在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 出河内转抵上海, 开展筹组‘和平政权’关头, 吴开先奉派潜伏上海, 从事破坏活动, 成为潜伏沦陷区的重要人物之一, 日伪视之为眼中钉, 必欲获之而后快。他被捕囚牢消息, 曾让朱家骅部长一连数日无法成眠; 而被捉放的经过离奇曲折, “曾引起沦陷区的街头巷议, 也使抗战区震惊疑愕”。<sup>②</sup> 蕴含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在抗战史研究范围内, 仍有加以解释之价值。

### 吴开先奉派潜回上海整顿党务

1939年8月28日, 吴开先奉派赴抵上海, 潜伏法租界, 任务为重振趋于衰败的党务与地下工作。盖是年5月初, 汪精卫等人由日人护送下从河内航抵上海后, 迈开组建‘和平政权’进程, 获得七十六号特工组织之威力声援, 行胁迫利诱手段, 四处招降纳叛, 以壮大阵容。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人员扼于情势, 投效‘和平运动’阵营者不乏其人, 顿使党务消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对此情况甚不满, 6月7日手令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等人, 称: “上海党部实在无成绩表现, 其无能力与无办法可知, 应特别设法改良为要。”<sup>③</sup> 朱家骅随即分电陈立夫、张厉生两部长, “请惠抒高见, 俾便商定办

①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一份1940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中职员名册》登载: “副部长为吴开先, 年四十二岁,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到职。”

② 朱子家: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 第146页。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致朱秘书长函’,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第五十六函(下引《朱家骅档案》藏处同); 蒋伯诚、吴开先报告。

法”。<sup>①</sup>

陈立夫接信，旋于6月13日回复，提议“最好催开先同志返渝，集商改进方案”。<sup>②</sup>当时，吴开先正在香港活动，朱家骅驰电促返。<sup>③</sup>但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先派遣候补中央委员郑亦同，代表组织部前往上海，视察党务。郑氏了解实情后，致电渝方，明指：“上海党务案，无下层基础，仅有少数上级干部。比因汪逆之威胁利诱，变节者变节，消沈者消沈，殊堪痛心。”<sup>④</sup>更指出党委中仅童行白、吴、张小通尚能保持节操，若汪曼云辈且为虎作伥。因此，建议“党部似非彻底改组，选任果毅而有学识品格之同志前来主持，恐不足以应付良莠而重奠革命之基础”。<sup>⑤</sup>特别推荐时任组织部副部长、且与上海渊源深笃的吴开先出马，挑负重任。在陈立夫与郑亦同一致认同下，朱家骅接受了建议。

吴开先嗣与蒋介石驻沪代表蒋伯诚一道于8月28日达上海，主持地下抗日活动。据其报告说：“开先业于俭(二十八)日安抵沪，现与伯诚兄分访各界领袖，均已晤面，甚欢洽。沪环境虽确甚恶劣，然事尚可为。决以最大之努力挽此颓势。”<sup>⑥</sup>

他们甫抵上海，正是汪精卫网罗投效分子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另立国民党法统之际；为阻止恶化情势蔓延，

① “朱家骅分致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6月8日，《朱家骅档案》第五十六函。

② “陈立夫复朱家骅函”，1939年6月13日，《朱家骅档案》第五十六函。吴开先后来在一封致朱家骅电中，提及其赴上海工作，系陈立夫所推荐。详见1940年2月9日电。

③ “朱家骅致香港吴铁城转吴开先电”，1939年6月13日。电文谓：“兹有要公，总裁盼兄即日返渝，特达。”《朱家骅档案》第五十六函。

④ “郑亦同致朱家骅电”，1939年8月23日，《朱家骅档案》。

⑤ “郑亦同致朱家骅电”，1939年8月23日，《朱家骅档案》。

⑥ “吴开先致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伦、朱家骅、张厉生、陈布雷、孔祥熙等人电”，1939年8月31日，《朱家骅档案》。

随即展开工作。曾有一电报告朱家骅,反映工作之困难,电文称:

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以图控制其群众,俾免纷纷反正,陷于崩溃……乞转商可均兄,速派妥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sup>①</sup>

当时,重庆方面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外,还有军统局、中统局等单位。经实地深入访察,吴开先洞悉原有特工组织趋于散漫。他说:

中央在沪之工作人员,亦未能相互取得密切之联系,工作既未集中,经费尤为奇绌……弟意中央在沪经费有统一集中之必要,而事权尤须有统率,则工作始易见效……弟意中央应将全部各方人员组成一组织,作为干部,由伯诚兄统率之,经费亦由其负责拨放……如此,工作始有展开之望也。<sup>②</sup>

最后吴开先请签报蒋介石,建议将全部工作化零为整,以坚强之组织与敌伪相抗,沪事才有希望。<sup>③</sup> 中央采纳其建议,决定成立“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以吴开先、杜月笙、蒋伯诚、戴笠、吴绍澍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任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吴开先为书记长。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所以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负责。关于吴开先与统一委员会关系及表现,杨天石先生利用台北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在《传记文学》发表过一篇文章,非常详实,值得参阅,此处不拟赘述。<sup>④</sup>

吴开先受任后,积极任事,打探敌方军情,宣导抗战国策,策动附逆分子反正,拉拢方面人物与民众团体,防制日伪继续挖角,进

① “蒋伯诚、吴开先致朱家骅电”,1939年9月5日,《朱家骅档案》第五十六函。

② “吴开先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30日,《朱家骅档案》。

③ “吴开先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30日,《朱家骅档案》。

④ 详参杨天石:《吴开先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传记文学》第71卷第1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97年7月),第35—40页。

行暗杀锄奸,使原已恶劣形势渐趋好转,表现出色。兹录吴开先在抵沪后未及一月向朱家骅陈报工作情形,如下:

抵沪后,对 蕻(即 默村)所胁持份子,已救出同斐成、张泳春、苏硕夫、顾荫千、柴子飞等十余人,均租屋另行居住。盲从而悔悟愿归者,亦有封光甲等十余人(均为中小学校长)。惟 蕻手段极辣,对反正人士辄施暗杀。租界当轴自欧战起后,更为退缩,而敌伪则凶焰更张,故持正不阿之士,亦人人自危;而反正之人更生畏惧。如何保障其安全,实至为焦虑之事也。<sup>①</sup>

在日伪严厉控制环境下,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能获致这样成绩,并非易事。也因为济助各方生活困难之同志,致携带款项转瞬用尽,不得不再请求拨款,以利工作推动。但其潜回上海整建地下组织的消息,很快被日伪侦知。日伪对吴开先等人的反扑举动,颇感压力,不仅特悬赏5万元捉拿,还在《中华日报》散播吴开先为“绑匪”消息。用心不可谓不毒辣。<sup>②</sup>

从此,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特工战。其中最大的攻击行动,就是擒贼先擒王,策划铲锄汪精卫。该委员会曾拟订暗杀汪精卫计划,试图破坏其筹组伪政权之行动,可惜因等无机会而未能实行。1939年11月起,适值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秘约谈判之际,吴开先等人即奉渝方指示,采取严厉举动加以制裁。吴开先在一封致上级报告的电文中,明白透露说:“行动方面,曾积极计划,俟机实施。惟逆贼防卫严密,不易接近为虑。”<sup>③</sup>周佛海1940年11月15日日记

① ② “吴开先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1日。由于上海市党部电台为汪伪占据,一时无法通报,此函系托其友人自香港寄发,《朱家骅档案》。

③ “蒋伯诚、吴开先致朱家骅函”,1939年11月14日,《朱家骅档案》。

也曾提及：“杨杰来，报告破获谋害汪先生之阴谋。”<sup>①</sup> 推想应该是出自该委员会的计策。周佛海 1941 年 1 月 1 日日记又透露，曾致函香港杜月笙，提议“宁、渝停止特务互相残杀”。<sup>②</sup> 由此可见双方特工厮杀之惨烈。后来“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发行伪币，企图取代法币流通，破坏金融安定，双方施展恐怖狙击，喋血事件频传，惊动沪上。为此，吴开先还曾奉派到香港，参加杜月笙、钱新之等人邀集的会商四行应付事宜之会议。<sup>③</sup>

## 日伪捉放吴开先经纬

自从吴开先回到上海后积极作为，确实提振国民党党务，强化地下工作，增添日伪许多烦扰。日伪必欲得之而甘心。从吴开先 1941 年 5 月中致电朱家骅报告险遭不测情形，即可窥知一二，电文谓：

铄晨，弟已陷身于敌方特务队包围之中，几遭不测。幸托福庇，于午刻安然脱险，现托身友处。来沪二年，所历艰险，无逾于此。幸一切工作机构未遭损失。我兄所存储备用之公文，亦均安然撤出，差堪告慰。<sup>④</sup>

吴开先素有“上海通”之称，欲捕获他并非反掌之易。当时，他住在极为冷僻的法租界麦尼尼路一所幽静的小洋房，深居简出，非

①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09 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第 439 页。

③ “蒋伯诚致朱家骅电”，1941 年 5 月 27 日，《朱家骅档案》。吴开先 10 月 8 日曾致朱家骅一电，报告已安抵上海，推测会议应在 10 月初召开，而且朱家骅也亲自与会。详见吴开先致朱家骅 10 月 8 日电及朱家骅 10 月 11 日复电。

④ “吴开先致朱家骅电”，1941 年 5 月 17 日，《朱家骅档案》。朱家骅收到此电时为 6 月 2 日，已过了半个多月。

很有关系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居所，探索其行踪。尽管他行踪极端隐密，但时常以电话向有关方面联络，还与较为亲近的人预约见面，因此也引起日伪极大注意。<sup>①</sup>日伪布下天罗地网，锲而不舍，也由于吴开先百密一疏，终于在吴开先返沪后二年半予以逮捕。吴开先于1942年3月20日被捕，10月29日出狱，计系狱八月余。出狱后一个月，移居上海寓所，乘监视稍松弛时，于11月28日撰写一份被捕系狱经过报告，密交可靠的人送到重庆，呈给朱家骅部长。此份报告最为真实可靠，收藏于《朱家骅档案》中，现即据以描述整个案情的梗概。<sup>②</sup>

据吴开先报告，其行踪所以暴露，主要是由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上海情形激变，一切均成动乱状态。中央欠各单位经费既多，而各方面需款孔急。他背负中央重责，自不容坐视，只好四出设法筹款应急。致为敌人侦知。加上与重庆通讯之电信密码本，被敌方检查台研破，故他筹款情形也为其掌握，遂加紧查缉。

事情起因于上海市党部一位旧工友孙守良，人称“癞痢头”，长相特别，被日伪盯梢捕获，经严刑逼供，吐露机要职员李光宙住所。日伪循线逮捕李光宙。李氏不堪刑拷，供出吴开先匿居的寓所。3月20日晨2时，日本宪兵队会同租界探捕及汪政权警政部人员至寓所逮捕。当时，吴开先正在批阅文电，尚未就寝，迅即跳楼自杀未果，旋又吞金和服毒欲自我了断，被日医灌肠救回。拘押“七十六号”月余，移押苏州，安排住李士群家，受到较好待遇。日伪先是威胁不成，改施巧取，制造吴开先已叛降谣言，企图拉拢他加入汪政权，一个月后依然无法迫使就范，遂被解送至苏州特工站监禁，又

①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146页。

② “吴开先呈朱家骅报告”，1942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第六十一函：吴开先被捕。

## 一月押赴南京。

6月3日，解往南京后的第三天，由李士群陪同会见汪精卫。<sup>①</sup>汪初尚客气，拟以伪职相诱，但吴表示不愿再过问政治予以坚拒。汪复询愿任何事，吴答以盼望息隐乡野，返回苏州，安享天年。汪大不以为然，继又询问几个问题，皆未获满意答复，甚感不悦。当日下午，得李士群许可，由原市党部同事汪曼云及特工人员陪往谒中山陵，入祭堂后，百感交集，泪湿衣襟。次日下午，李士群陪见影佐祯昭，影佐显露傲慢姿态，吴开先则一心耿直，两造就和平问题各说各话，不欢而散。翌日，还押苏州特工站，李士群下令自6月10日起不再给予优遇。

后经其沪上好友徐采丞奔走营救，据说花费三百万法币购买日方特务机关。另一方面，李士群有意保全吴开先生命，图日后藉以减免罪责，因此监禁稍为放松。至10月7日，吴妻忽得李士群通知到苏州，次日即由唐生明伴送至上海，住唐寓，但容许吴开先可以回家探视。日伪固然许吴开先局部自由，却设定若干限制：不许离沪，不得反对和平，不可拒绝日伪人员之访询。名义上获得自由，暗中仍受严密监视。<sup>②</sup>

11月18日，日本松井的幕僚长滨田大佐及总司令部科长都甲大佐会见吴开先，与谈中日事变问题，探询与重庆国民政府和平的可能性及是否愿意代为传达日方渴望和平的讯息，经吴义正严词说明，除非日本放弃独霸东亚、殖民中国的政策，并尊重中国之独立与自由，否则殊无结果可言。日伪宪警人员仍在吴开先寓所周围布置密探，侦察动静，所以他甚少外出。吴开先报告只记到这里，

① 据《汪精卫日记》(未刊本)记载，汪精卫晤见吴开先日期为6月4日。

② 据《汪精卫日记》(未刊本)记载，10月16日，在李士群、唐生明夫妇陪同下，吴开先夫妇又面见汪精卫。惜谈话内容不详。

往后获得释放送返重庆的遭遇,则从事后各方电报可以理出头绪。

1943年3月15日,朱家骅接到吴开先电告,已获全部自由,一切不复受限制,正作离开上海之准备,约月底启程返渝。<sup>①</sup>实际启程日期是在4月6日,由曾任暨南大学日文教授袁文彰陪同搭机离沪,取道广州湾经廉江,至桂林返渝。<sup>②</sup>渝方饬令各有关人员沿途照应,或提供汽车代步,或差人引导随行,或预购机票,俾能顺利返回重庆。是月下旬吴开先安抵桂林,再转返重庆,确实时间,有待追查。

### 渝方反应与营救

吴开先潜返上海两年半多,苦心经营,上海地下工作好不容易重建起来,表现甚得朱家骅肯定,而且不避艰险,“自信生死有命,既来此虎穴,必不退缩一步,但愿工作得有寸效”之赤胆<sup>③</sup>,更让朱家骅激赏不已。1940年11月间,在重庆发生一椿攻击吴开先行为不检的事件。即原先推荐他到上海来的郑亦同返渝后,曾挟嫌报复,向中央举发吴开先不轨。吴开先闻悉,致电朱家骅提出解释,要求代为主持公道,以免遭受谣言之诬诋,并请中央严查究竟,以明是非。<sup>④</sup>此事在当时引起一阵骇异。朱家骅复电慰勉,除赞扬吴开先“主持沪事,荏劳卓著”<sup>⑤</sup>,还劝勉他“公忠体国,何恤人言,幸勿介怀”。<sup>⑥</sup>充分显示对吴开先信任有加。

① “吴开先致朱家骅电”,1943年3月15日,《朱家骅档案》。

② “吴绍澍致朱家骅电”,1943年4月6日,《朱家骅档案》。

③ “吴开先致朱家骅函”,1939年9月11日,《朱家骅档案》。

④ “吴开先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15日,《朱家骅档案》。

⑤ “朱家骅致吴开先电”,1940年11月19日,《朱家骅档案》。

⑥ “朱家骅致吴开先电”,1940年11月19日,《朱家骅档案》。

面对这样一位敬业地下工作者，日伪深感芒刺在背，防不胜防。而其被捕牢笼，对重庆方面来说，不啻为一大恶耗。3月初，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曾接获上海单位情报，一度讹传吴开先及其他单位重要人员被日伪破获劫捕，引起一阵紧张，经设法探询，得到吴开先回报安全的消息，方才释怀。<sup>①</sup>不过，吴开先坦白指称，沪上环境险恶，一星期内各单位负责人被捕者闻有王良仲、蒋光堂等7人，余都迁匿起来，各单位间一时不能密切联络。他自己也深居不出，等候空气稍弛，再行设法联络。<sup>②</sup>可见当时的上海，在日伪严密搜捕下，确实呈现出一片风声鹤唳状态。

朱家骅部长从各方接获吴开先遇捕的报告，本来还半信半疑，至4月1日始信确有其事，时他正在南山养病，闻讯心痛至极。4月15日，批阅上海市党部4月11日自浙江拍发的电报，更证实消息无误。旋复电称：“恶耗初到时，为之三夜不睡，从此失眠之症复发。多年之上海工作几已毁于一旦，于公于私，痛心曷极！”<sup>③</sup>且以派遣吴开先返沪，“又照料无方，致出此事，实属咎无可辞”，而深感自责，将此心情函告徐恩曾说，将何以对同志和朋友？<sup>④</sup>在当即指示，不惜巨资，全力营救，其致蒋伯诚函，嘱：“务请就近设法继续营救，使其早日恢复自由，任何费用，在所勿惜，无论如何，当向中央力为设法，可无问题也。”<sup>⑤</sup>朱家骅的激烈反应，足以代表重庆方面的立场，盖一因吴开先党职高，亲蹈虎穴，表现良好，不负重寄；复因痛心地下党务工作再度受挫，将愧对蒋介石期许。可是，事关重大，他还是把接到的恶耗呈报蒋介石，并随时注视事情发展。

① “朱家骅呈蒋总裁文”，1942年3月30日，《朱家骅档案》。

② “吴开先致吴绍澍转朱家骅电”，1942年3月29日，《朱家骅档案》。

③ “朱家骅复上海市党部电”，1942年4月16日，《朱家骅档案》。

④ “朱家骅复徐恩曾电”，《朱家骅档案》。

⑤ “朱家骅复蒋伯诚电”，1942年5月20日，《朱家骅档案》。

渝方除指示上海的吴绍澍、蒋伯诚悉力营救外，中统、军统系统亦皆受指令展开营救，杜月笙也动用上海关系，施以救援。11月6日，朱家骅报吴开先已释放，恢复局部自由后，甚为关怀其生活，迭电吴绍澍就近尽量接济，并请转电吴开先，表示“闻兄出来，吉人天相，欣慰莫名”，“务请多多休养，在不冒险之下，盼能觅机返渝”。<sup>①</sup>在朱家骅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发送10万法币（折合伪币5万元），作为营救吴开先与接济家庭生活之费用。据吴绍澍报告，吴开先遇捕时，寓所被抄，全部损失；在押时，又多方营救，所费尤钜。虽经中央济助，但近况仍甚拮据。朱家骅得悉后，呈报蒋介石，建请“宜续拨若干，以资救济”。<sup>②</sup>

重庆方面为营救吴开先付出的苦心与努力，可见一斑。迨接获吴开先得以返渝消息，又展开一场热烈的保护及照应行动。朱家骅于1943年4月10日收到吴绍澍电报，谓：

衡（吴开先）君已得敌伪同意返渝，今晨由敌派遣军部代购机票飞港，有留日学生曾任暨大日文教授之袁文彰同行，将由广州湾经廉江至桂林。嘱急电吾公，并转告布（陈布雷）、果（陈果夫）、立（陈立夫）、铁（吴铁城）、月（杜月笙）、雨（戴笠）诸公，饬有关部队及雨兄人员一接，并希有汽车代步。约本月卅（十五）日前后可到桂林。机票亦请代定。此次顺利脱离虎口，经过情形当由开先兄面陈。<sup>③</sup>

朱家骅随即分电陈布雷等党政军要员，分头布置接应照料。同时掩不住内心兴奋心情，一路关怀行程。当吴开先赴桂林途中，戴

① “朱家骅至吴绍澍电”，1942年12月19日，《朱家骅档案》。

② “朱家骅呈蒋中正总裁文”，1943年1月30日，《朱家骅档案》。

③ “吴绍澍致朱家骅电”，1943年4月6日，《朱家骅档案》。

笠回电称，他已电桂省同志妥为照料。<sup>①</sup>及抵达桂林，朱即电桂林刘书记长转达慰问之意，谓：“前兄脱险离沪，无时不以途中辛劳为念。顷审安抵桂林，欣慰何量……久思良晤，延企为劳，敬电欢迎。”<sup>②</sup>

## 吴开先获释脱险原因探讨

吴开先曾经是汪伪悬赏捉拿的要角，遇捕后除监禁提讯外，并未遭受拷刑逼问，有时还得到稍许优遇，其中原因值得玩索。前述吴开先报告中，已经提到两个因素，一是好友徐采丞购买日伪特工，一是李士群为己谋而有意示好。还有投汪的旧市党部同事，多人为他奔走营救，其中以原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蔡洪同两个出力最多。<sup>③</sup>此外，周佛海尽力保护，恐怕才起最大作用。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吴开先在报告中却只字未提晤见周佛海事。

金雄白，笔名朱子家，本人就是汪政权中人，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为早年研究汪政权史事之基本素材，所述真实见闻固有之，捕风捉影者亦不少，甚至还有杜撰作伪的部分，只要细心研究当可察觉。他受周佛海说服加入汪政权，与周佛海交情深笃。该书中有两章述及吴开先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拘禁、审讯及释放经过，参照其他史料记载，真实性相当高。据他说，吴开先被捕消息，报纸上并未发表，连耳目接近的人竟也一无所知。有一天，他去看周佛海，刚好周在会客，便在邻室等候。等候时只听到细微的交谈声，不解谈话内容，接着闻到一阵啜泣。及会客结束后，见吴开先与

① “戴笠致朱家骅电”，1943年4月17日，《朱家骅档案》。

② “朱家骅致吴开先电”，1943年4月26日发，《朱家骅档案》。

③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149—150页。

周佛海一前一后步出，周送吴到门口，也哽咽地说：“放心，我会尽一切可能的力量。”然后目送特工万里浪押走。这才知道是吴开先被捕了。<sup>①</sup>金雄白特别强调周佛海在吴案中的表现，把吴开先获释功劳归诸周佛海的奔走营救。翻查周佛海日记，有几则记及与吴开先晤见事，摘录如下：

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

下午，接见吴开先。吴奉谕命在沪工作两年，一周前始被捕，旧友也。相见彼此垂泪，百感交集。谈两小时，相约设法使宁渝间能互相谅解，共赴国难。旋接见金雄白。<sup>②</sup>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

下午，吴开先来，谈两小时。谈及蒋先生及孔庸之等对余之态度，不禁百感横生。余亦将和运之经过及现在之情形、将来之趋势，详细阐述，甚盼和平早日成立，一切故旧能握手言欢。<sup>③</sup>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

约吴开先来谈，并便饭，谈全面和平及宁渝统一问题。<sup>④</sup>

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

见客数人，并约吴开先来谈，拟与日方交涉，任其返渝，俾相机传达和平意见。<sup>⑤</sup>

同年四月四日：

接见吴开先，渠明日飞广州，转赴重庆。告以此时渝方和

① 朱子家：《狂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149—150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下），第669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下），第759页。

④ 周佛海日记（下），第767页。

⑤ 周佛海日记（下），第821页。

平之机未到，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本身必需合作，谈一小时余。<sup>①</sup>

吴开先与周佛海私交甚笃，从这几则日记可知周佛海有意运用个人影响力帮助吴开先返回重庆。以他在汪政权的地位及与日本关系，只要对吴开先案关照一下，必能使吴开先获得善待。

战后周佛海接受审判时，供称系由他做保，汪精卫才同意释放。1945年11月2日上午9时30分，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审判长赵琛讯问时，有一段相关问答：

问：又有蒋伯诚、吴绍澍之信，你与他们有何关系？

答：他二人一向在上海。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租界无掩护，他们跑来跑去，有同学戴济民代我向蒋、吴通消息（给）他们。结果有一次蒋生病，于是被捕。吴与蒋是一起的，后来也是我营救他的。

问：吴开先之信情形如何？

答：三十二年后之事，太平洋战发，出渝派沪工作，被捕送与汪，由我保他，汪即将他放出。

问：你们招待他吗？

答：有的。

问：你们说“看错了”，有此话吗？

答：有的。

问：你是诚意救吴开先，或是利用他？

答：可传吴开先来证明。<sup>②</sup>

① 《周佛海日记》（下），第836页。

② 讯问中审判长提及的蒋伯诚、吴绍澍及吴开先信，是指三人应周佛海辩护律师与南京高等法院要求，就援救政府地下工作人员一节作证时，三人书复的证函。参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3页。

吴开先也具函向高等法院作证,证实:“查本人于民国三十一年春在沪被敌伪捕获时,周佛海确曾尽力营救,并来探访,又面嘱敌伪特务机关不得虐待。秋间将本人解至南京后,又设法疏通汪逆,俾获自由。”<sup>①</sup>

周佛海是抓住日本希望与重庆国民政府和平的心理,向影佐祯昭再三建言释放的。但是,所以挺身保护吴开先,当然有其私下盘算:一、此时周佛海已经密委有关人员向重庆示好,如能斡旋释放吴开先,自属大功一件;二、利用吴开先向渝方传达他们的和平意向,寻求谅解。后来事实证明,周佛海作了有利于己的决定。

## 结 语

抗战前上海是个经济金融中心,物资充沛。抗战爆发后,日军抢攻上海,国民政府基于长期抗战考量,撤走了不少人员与设施。但是,还留有地下组织及工作人员,暗中活动;尤其当汪精卫等人出走到沪上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活动更趋活络。日伪反制也不遗余力。曾任国民政府军事统计调查局(通称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于1941年10月底不慎陷落敌网。事隔数十年之后,重忆起那一段往事,犹且沉痛指称:自三十年初开始,汪伪特工总部与日本宪兵队联手,放下他务不顾,专事对上海敌后工作人员展开地毯式的搜查和逮捕。<sup>②</sup>吴开先虽出身党务系统,也一样成为日伪严侦密捕的对象。

吴开先以老上海人回到故乡,潜伏法租界进行地下工作,深居

① “吴开先致首都高等法院函”,1946年10月14日。详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173页。

②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页。

简出，行动极端诡秘。他深入虎口，重整组织，反击日伪，扭转情势，获致明显效果，不负渝方托付。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占领英、法租界，使得地下活动骤失掩护，吴开先居处曝光，才束手就逮。幸赖周佛海这班人设法搭救脱险，否则以日本军宪对捕获之特务人员施予严厉处置之惯例，吴开先想脱离虎口恐难如登天。从这一点来观察，他们的出发点容或为了私利，但是搭救政府地下工作人员，乃是不争的事实。在媚敌之下，犹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

由于吴开先的特殊身分，其被捉放经过，自成为渝方与日伪地下斗争中一个较引人注目的事件。日伪释放吴开先，并不意味着对卧藏地下的工作人员松懈了警戒，事实上搜捕行动始终非常严紧。例如，后来吴绍澍遭围捕、蒋伯诚和万墨林等先后落网，都呈现惊心动魄的一幕。<sup>①</sup>

吴开先获释回重庆后，脱离黑暗中的地下工作，继续投入抗建行列。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6年1月，出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兼市党部委员；11月，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1月，从地方到中央，任职社会部政务次长。角色几经变易，但其在战时出入敌窟的经历，恐怕才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惨痛回忆。

（作者邵铭煌，1956年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吴绍澍于1943年5月间，寓所遭日方围捕，幸其本人不在寓中，其夫人则冒险逃脱，但胞姊及子女共四人都被捕去，拘押宪兵总部，遭受刑讯。而且扩大搜查范围，牵连十余人，企图一网打尽。各处人心，为之震动。蒋伯诚于1944年5月初，因突患脑溢血，仓促延医，而为日方侦知，包围其寓所，夫人和子女均一举成擒，万墨林夫妇也一并遇捕。详见1944年5月14日“蒋伯诚致朱家骅特急电”，及1944年5月23日“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支团部致中央组织部急电”，《朱家骅档案》第五十七函：吴绍澍报告。